

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中国史学中的应用与发展

汪子涵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科学的、革命的,更是在与学术实践及社会实际相结合当中不断创新发展的。这种发展性和进步性,既体现在马克思本人在探索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亦体现在中国史学的应用与发展中。当下面对日趋复杂的时代发展境况,中国史学界更应坚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石,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辩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原则。这既是中国史学在新时期进一步融入世界学术潮流、不断发展的需要,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创新与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史学^①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77(2021)01-0114-06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唯物史观核心思想的形成主要归结于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开始就唯物史观中的某些问题展开探讨,如通过对人的劳动进行分析研究其社会关系。此后经过不断的理论演化和批判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对唯物史观的表达,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肇兴于20世纪初,彼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具备相当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淀,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社会科学方法论引入各学科的理论构建中,于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应运而生,郭沫若、翦伯赞等第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秉持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史及近代历史进程进行考察,在不断拓展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同时,在学界逐渐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学术话语体系。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

命性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人所认可,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学术成果的日渐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终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学派。时至今日,其科学性和思辨性依旧指引着中国史学的发展,带领中国史学走向更加广阔的发展领域。

唯物史观学术话语体系在中国史学界确立的历程,不可谓不激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应用、发展的历程,即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历程。国之大运,在其文脉,文脉之中又以史为本为重。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一切积极成果,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开创性地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架构,并以科学的社会历史观指导人们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进而从实践出发改造社会,创造历史。探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路径及其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不仅能够明晰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历程,更对深入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大有裨益。

^① [收稿日期] 2020-10-20

[作者简介] 汪子涵(1997-),女,山东济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史研究。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及其思想价值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宝贵的成果，它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马克思大学期间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认同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同时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不甚透彻的，需要将辩证法贯彻到底。而此后有两大因素最终促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学的看法：其一，是他于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时的经历，其二，是对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需要》的阅读与思考^①。前者促使马克思愈发深入地接触德国社会现实，使其开始思考社会实际问题中社会经济和物质利益的作用与实质。在此情境下，马克思愈发强烈地意识到，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秩序是不受理性决定的，而是遵从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维护其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的工具；后者则催生了1843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受费尔巴哈哲学和历史分析的启发，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并在注释中同时批判了君主制，并作出了“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②的论述，这一观点与最终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一脉相承，也是马克思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的一大转折点。

学界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雏形可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手稿》中最重要的论述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③的探讨——马克思藉此探索和剖析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劳动的异化首先表现在劳动者的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上，即“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④；其次表现在劳动自身的异化，即“对劳动者说来，劳动是外在的东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⑤；再次表现在劳动

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是类的存在物”^⑥，而当上述中异化的劳动将劳动产品从劳动者处剥夺，再从外部强加于劳动者，人的类本质也就与作为劳动者的人自身相异化了，人类的本质成为维持生存的手段，最终结果只会是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发自觉的劳动，而异化劳动使人悖离人的本质，要进入人的社会，就必须扬弃异化劳动，如此，由异化劳动催生而成的私有制社会也将被扬弃。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论述中，实际表达出两个十分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一，是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其二，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观点，以及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后者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论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至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具轮廓，其主要成就表现在对历史主体的认知与揭示，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初步表达。

马克思于1845年的两部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扬弃了此前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正式将实践的观点引入社会劳动中，揭示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探讨，揭示出人、实践、人类社会存在发展、历史的创造形成之间的本质关系。如此，以实践的观点为基础，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本观点，以人民群众为社会历史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在其科学性，马克思全面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过往任何学派的历史观都从未从实际出发，从客观现实生活出发去阐述历史，他们或将历史视为绝对观念的发展，或将人视为单纯的感性动物，而忽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将人与物质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推动物

质社会发展的基础齿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在其革命性，在揭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阶级、国家和社会形态的关系，指出当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就必须变革生产关系使其适应，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变革往往表现为革命，而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支撑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必然会再现矛盾，而无产阶级必将承担起这一变革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价值，更在于他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以及鲍威尔等将人民群众与历史相对立观点的彻底批判，将“人”回归到一个现实中的，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个体，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而非一个抽象化、感性化的概念。历史中的人并非虚物，马克思克服了过往学者对社会发展根源的主观化认识，从根源上摆脱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窠臼，在人类思想史上首次呈现出唯物史观的面貌，它不仅科学客观地揭示出社会发展的根源、历史演绎的规律，将人类历史轨迹清晰绘出；更蕴含着远大的社会理想和深邃的人文关怀。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在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中国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为社会各界所关注。要明晰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而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⑦。如此，围绕“中国社会是怎样的社会”这一论题，各方学术观点及其背后的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激烈交锋。这场论战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的确立，此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核心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逐渐发展壮大，确立起独立的话语体系和学术风格，并最终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力量。

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史论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参与论战的各方史家学人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及政治诉求。以此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应归于郭沫若、王学文等史家

对中共六大所确认的“中国当前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观点正确性的论证。在此次论战中，唯物主义史观得到了极大地传播，中国史学界藉此开始注意并重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经济因素，立于实践观点和社会存在决定性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学术土壤。彼时论战的三大核心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其他类型的社会问题的探讨，也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建立发展派生出中国史坛著名的“五朵金花”^⑧研究，即对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的形成等五个重大理论问题的集中研究。

其中中国古史分期研究的框架源于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划分，其核心本质归于对社会所有制的探讨，此间又以“中国何时封建”的讨论为最，关于此论题诸说并起，不同观点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相互碰撞，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学在整体、宏观历史研究视角上的开拓；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则是中国史家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两大典例，也是古史分期问题的具体延续，取得了丰富的学术理论成果，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从社会经济角度揭示中国历史变化的学术范式，对此后的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影响深远；农战史研究的转变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一大特点，传统史学往往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视为动摇帝制王朝统治的“匪乱”，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随着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和社会矛盾运动观念的普及，农战史的研究一改以往旧轨，其意义与历史影响逐渐为史学界所重视；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孕育于19世纪下半叶，其诞生源于民族危机的深重与民族意识的觉醒，进入20世纪依旧为史学界所重视，并延伸出对“中国民族”性质定义的探讨，对中国民族认定、民族认同及民族团结等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五朵金花”问题的研究达到鼎盛，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间，史学界对“五朵金花”问题的

讨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现象之一^⑨。“五朵金花”作为唯物史观下诞生、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支撑中国史学发展的几大基础问题，既是学术的产物、思想的产物，亦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的产物，其研究中不乏过于机械性和政治化之处，譬如中国史学界对马克思五种生产方式的机械套用，时常忽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又譬如农战史研究中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学界受社会政治运动影响而产生的“厚古薄今”浪潮，如此，实际皆悖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原则和本质，极易偏离科学的轨道而走向极端。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史学反思浪潮的推进和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的“新文化史”因其独特的史学视角和前沿理论建构，逐渐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并展开实践的崭新领域，以往“十七年”期间“五朵金花”的研究转而受到学界的反思与怀疑。“五朵金花”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成果，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背景下，学界开始对过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进行深入反思和全面研究，一方面为20世纪末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实的社会发展向历史学提出挑战”^⑩寻找答案，另一方面亦探求社会发展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与发展的新通路。

整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危机”源于国内“拨乱反正”引发的意识形态领域震荡。在这一时期，中国史家的转变主要集中在两大方向：一是开始吸纳欧美后现代史学的研究理论及学术范式，关注历史叙事及话语、仪式和再现中的权力运作机制，并以此开辟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二是将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史学研究，构建起跨学科的史学研究视域。二者中皆蕴含着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审视，即“要解决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危机，要推进中国的历史科学事业，我们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当前正面临着必须打破三十多年来所定型了的这一套旧理论范式的任务”^⑪，而这套“三十多年来的旧理论范式”，即长期以来被

固化、公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分期五段论。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历史研究和实际日趋结合，越来越多的历史学人认识到，将五段历史分期机械地套用进中国历史研究，不仅无法妥帖地揭示出中国历史的整体发展规律，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相悖，且“把中国历史纳入既定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而不顾中国的历史实际，让人很难看出其中有多少中国历史特色和气派来”^⑫。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史学界亦开始萌发出对具有中国特色历史研究范式的追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过学界的审视与批判，在坚定唯物史观根基的基础上，开始走向扬弃继承过往学术思想体系，追求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史学研究发展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中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科学的、革命的，更是在与学术实践及社会实际相结合中不断创新发展的。这种发展性和进步性，既体现在马克思本人在探索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亦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应用与发展中。20世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社会史论战中的应用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历史学人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社会生产为基石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脉络，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在清末学人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新史学”之后，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进程，并最终建立起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史学学术体系。尽管在特殊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出现过公式化、教条化的不良学风，但时至今日，其依旧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作为中国史学的坚实砥柱。20世纪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演变，既是学界上下求索的轨迹，亦是时代推动的结果。时代选择了科学、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亦在代代历史学人的学术实践与现实思考中不断应用发展，引导学界在如何认识中国历史，如何

洞悉历史发展规律,如何以史为鉴、实现史学理论与社会实际发展相结合等问题上不断探索,不断超越。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中国现当代史学学术体系的骨骼,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哲学理论基础。21世纪以来,在扬弃继承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并吸收借鉴西方后现代前沿史学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浪潮中激流勇进,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尽管如此,中国史学发展当下依旧存在许多问题,史学发展依旧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主要表现有三:其一,20世纪末以来西方各派史学理论的流入尽管拓宽了国内史学研究视域,但不加筛选且浮于表面地应用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史学理论,使得中国史学研究的整体格局陷入困境,不仅唯物史观宏大叙事未能得到很好的再创,新理论、新流派的出现更吸引大量历史学人转入微观专题和细小研究,在宏大叙事缺失的环境下,历史碎片化现象十分突出,以致有学者指出“当前史学碎片化的根本症结在于我们抛弃了新中国前三十年曾经树立的史观。”^⑩其二,中国史学的正统学术研究愈发“高高在上”,而在大众史学领域,史学通俗化

所带来的文化快餐和庸俗化历史文本正日渐蚕食着民众对历史的认知。一方面,在当下社会中,史学所参与的社会领域日趋缩减;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又具有对史学文化获取的需求,中国史学的理论、叙事与社会应用实践出现脱节。其三,作为冲击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余浪,历史虚无主义开始抬头。《历史研究》曾于2015年以“历史虚无主义评析”作专题,编者按即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⑪在中国史学研究领域乃至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史虚无主义都是危险的。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阐释历史,就无法科学地认识现在,更无法合理地指导未来。如此,面对日趋复杂的时代发展境况,中国史学界更应坚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学术基础,平衡引入西方学术理论范式和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客观辩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变挑战为发展契机。这既是中国史学在新时期进一步融入世界学术潮流、不断发展的需要,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创新与发展的要求。

注释

①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64页。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③“异化”源自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曾使用过的概念。

④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4页。

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7页。

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8页。

⑦左玉河:《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史学月刊》,2019年第7期,第9~11页。

⑧“五朵金花”最初被称为“五朵花”,出自翦伯赞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批判向达的发言。文革后始见“五朵金花”的说法。“向达则提出历史学只开五朵花的问题……只看到这‘五朵花’,而且最讨厌这五朵花。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的花朵,而且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开出这五朵花来。”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人民日报》,1957年10月4日。

⑨张越:《“五朵金花”问题再审视》,《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8月,第91~93页。

⑩舒嘉:《历史学的沉思:挑战和机遇》,《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⑪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从近年出版的两部史著看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读书》,1986年第11期,第42页。

⑫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⑬廉敏:《发现中国古代史学在当下的理论价值》,《“史学研究的挑战与回应”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5年,第56页。

⑭《笔谈: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历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4~21页。

参考文献

- [1] [德] 马克思, 恩格斯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神圣家族, 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 [2] [德] 卡尔·马克思著, 曹典顺译.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M].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9.
- [3] 翦伯赞.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4] [德] 马克思, 恩格斯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德意志意识形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5] 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 [6]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史学研究的挑战与回应”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册) [C]. 2015.
- [7] 张越. 20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发展和演变 [J]. 学术研究, 2001, (12): 12~18.
- [8] 史革新. 关于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问题的几点浅见 [J]. 南开学报, 2002, (2): 7~9.
- [9] 孟广林. 唯物史观与思想文化史研究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3, (3): 16~28, 158.
- [10] 邹兆辰. 近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方法的创新 [J].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09: 26~41.
- [11] 邱爱辉, 成晓曼, 姜浩.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及主要贡献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2): 25~28.
- [12] 左玉河.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 [J]. 河北学刊, 2013, (3): 46~50, 55.
- [13] 牛润珍. 唯物史观的新机遇与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 [J].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4): 53~57.
- [14] 于沛. 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 [J]. 历史研究, 2015, (3): 9~13.
- [15] 郑师渠.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之我见 [J]. 历史研究, 2015, (3): 13~17.
- [16] 武力.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历史虚无主义辨正 [J]. 历史研究, 2015, (3): 17~21.
- [17] 陈其泰, 屈宁.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道路的对话 [J]. 社会科学文摘, 2017, (1): 104~107.
- [18] 刘小红.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的建构路径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7, (1): 76~80.
- [19] 刘玲. 谈当代中国史学变革中的原则坚守 [J]. 合肥学院学报(综合版), 2017, (6): 117~121, 138.
- [20] 李勇. 论中国史学面临的“挑战”——学术史视阈中的考量 [J]. 东岳论丛, 2017, (9): 60~67.
- [21] 张艳国. 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意义 [J]. 中国史研究, 2018, (2): 21~25.
- [22] 杜艳华.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历史与历史研究再探讨 [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6): 115~121.
- [23] 张文彪.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当代中国改革实践——重温习近平《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 [J]. 观察与思考, 2020, (3): 40~45.
- [24] 赵梅春. 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 85~95.

[责任编辑: 董婧婧]